

官员变成政协委员：阵地变了 服务国家不变

本报记者 刘世昕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曾经或当下依然是某一部委的部级官员。据不完全统计，审计署有4位部级官员成为政协十二届委员，国家发改委也有多位副主任出现在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中，就连在全世界有名的“人民币先生”、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首次作为政协委员亮相了昨天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开幕式。

对媒体来说，依然希望把他们作为官员来提问和审视。而他们本人却面对对自己新身份的认知和适应。

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是经济界别的新委员，他说原来以为到了政协，就是退居二线了。可没想到政协对委员的定位是，“处在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第一线，处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第一线”。

董大胜说，从审计一线到了政治协商的一线，意味着自己还有很实际的事情要做。他专门研究了上一年政协的提案数量，5年，2.5万件，平均下来，每个委员一年至少要提交2件提案。要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还是很艰巨。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董事长梅兴保已经是第二次当选全国政协

委员，他用自己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董大胜，政协的工作一点也不比政府部门轻松，绝不是只会“拍拍手，鼓鼓掌”。

他说，自己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还没有从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大部分的精力还在企业。等他真正离开企业，认真做起委员以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点，一条线，而现在所关注的都是全局的经济问题。要想写出有质量的提案，还真得靠几名委员相互讨论和碰撞。

梅兴保说，自己在企业当老总时，已经

很久没有为写材料加过班了，但当了政协委员后，有时候写调研材料，还要熬夜。”也有人问我，到了政协还熬夜加班，是错把二线当一线，还把政协当政府。但我认为，政协委员的定位既然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一线，那么服务人民的宗旨不会变。”

过去5年间，梅兴保提交了10多份有分量的提案，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越干越有劲。

新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监事长姚忠明说，原来也以为只是来鼓鼓掌的，现在发

现政协委员议政的任务还挺重。按照政协的职能工作方式，他给自己拟定了一份未来的调研计划，首先要调研城镇化进程中，金融如何起支撑作用；其次调研金融机构如何成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老委员李毅中退下来之前也是政府高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他对新委员的忠告是，“到了政协，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官员代表委员该如何履职

本报记者 王亦君 白皓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今年第一次当全国政协委员，从大会报到开始，他就被众多记者围堵堵截。同样“遭遇”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部长姜伟新，2日下午，他在驻地停车场刚一露面，就遭到了媒体狂轰滥炸般的提问，以至于他不断向记者们抱拳鞠躬，“求你们别问了”。

每年的全国两会，媒体围堵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官员，已经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

对媒体发表意见时，他们究竟是官员还是代表、委员？

在今天上午经济界政协委员小组讨论会上，蔡鄂生主动谈起了这个话题，“媒体记者们请我谈金融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但我也不是全才，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啊。”

蔡鄂生说，自己正在试着转变成为一个政协委员的角色，站在个人的角度上谈对金融、社会等问题的看法，“但是谈出来人家不会认为你是站在一个政协委员的角度上谈的？”

蔡鄂生担心，自己转变成了一个政协委员的角色，而外界还把自己当成银监会副主席，“你说我的话人家当成政策解读，那不就坏了吗？”

“我们这种有公职的委员回答记者问题的话，是转换角色了，还是没转换呢？”这是蔡鄂生心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蔡鄂生的办法是，现在被记者提问，只谈个人认识，不谈结论。

蔡鄂生笑着说，这种回答就是谈谈自己的认识，大家认为有道理那就有道理，认为胡说八道，就是胡说八道。

“畅所欲言的场合就是谈自己的感受，发言结尾我都说不对的请批评。其实你走了谁批评你啊，也就是记者评论你两句。”蔡鄂生的发言引发了全场的笑声。

在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看来，“担任政府部门官员和做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这两种角色并不矛盾”。

今天上午，胡晓义所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小组讨论一结束，他就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有关养老金双轨制、养老保险金亏空、城乡养老保险不统一等诸多备受公众关注的问题。

“在政协，我履行的是政协委员建

言献策、民主协商、监督的职责，当我回到单位，履行的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职责。我刚才回答你们那些社会保障政策问题时，你们面对的是一名部长，不是政协委员。今天上午我坐在这里，听同组委员发言，我就是一名政协委员。”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自己既是官员又是政协委员的身份时，胡晓义说。

胡晓义是新委员，“没有当政协委员时，我参与办理过很多政协委员提出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提案，凡是经过我手的，每一件我都认真看，签上我的名字，都会和委员沟通，询问能否他们达到他们满意的程度，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现在当了政协委员，我肯定会提出提案，我有我的经验和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认识，我的提案肯定会和我的工作相关，我不会就一个我很生疏的领域提出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同样很坦然，在今天上午政协经济界别分组讨论会后，他在现场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大约20分钟的采访，大部制改革、市场监管、奶粉可信度低、购物网站乱象等问题都“来者不拒”，坦率地将自己的观点一一说出。

“为什么愿意这么坦然地接受采访？”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周伯华说，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对社会公众要信任，对媒体要信任，我信任别人，别人才会信任我，“我说错了可以批评，这就是我开始学着当委员了啊！”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教授多年从事人大制度的研究，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一定数量的官员，是由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国务院各个组成部门和办事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现任或已经卸任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媒体对于他们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对于获取政策信息、制度走向的渴求”。

“一般来讲，拥有官员身份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掌握的信息，会比普通的代表、委员多，如果掌握的这个信息是应该被公众所知晓的，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媒体，让他们告诉公众。”焦洪昌说。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康（前排左）、李克穆（前排右）在分组讨论上聆听委员发言。作为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回答记者有关“城镇化是否会扩大地方债务”的提问时表示，“确实是不能说一点可能性没有，这需要关注。” 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在分组讨论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作为大部制改革试点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前部长，他表示，大部制要做好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融合，同时，也要授权有限，要受到监督。 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3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部长陈竺被记者重重包围。陈竺表示，相关部门的监管一定会加强，要让人民对食品、药品放心的感觉。 本报记者 陈剑摄

委员提案要增强建设性 政府回复要提高重视度 “回复是套话，我提案的热情就受打击”

本报记者 王怡波 刘世昕 丁先明

“提案的回复如果是套话，我提案的热情就会很受打击。”3月4日，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的一席话引起多名委员共鸣。十几名在讨论中发言的委员，有一半谈到了对提案和提案办理的思考。

委员们的共同感受是，政府对提案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办复效率也在提升，十一届政协期间，28930件提案中，有26583件提案已办复。但一些提案的办复质量不让人满意，一些委员收到了敷衍了事的回复。“基本上就一套，您提的非常有道理，我们将在工作中研究采纳。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李军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去年参与了一份由上百名专家委员参与的控烟提案，但办案质量并不令他满意。“那是一份凝聚了众多专家共识的提案，质量很高，分量也很重，可是承办单位只是给了主提案人一个礼节性回复，接下来并没有实际行动。”

在政府部门的态度屡受批评的同时，

也有一些政协委员提到，部分委员的提案质量不高也应引起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告诉记者，发改委在国务院机关承办人大政协提案提案是最多的，占了五分之一，“我自己参与回复非常多，除了作为国家机关应该认真办理，提案也应该进一步提高质量，思考选题、深入调研，形成有分量的提案”。

张晓强在参与回复办理时感到，有些提案针对性、操作性不强，政府就能马上做出改变，但有些提案泛泛而谈，只提一个方向，办复机关就难办了。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对此深有同感。曾在多个部委做办公厅主任的陈啸宏，有10多个年头都在接办政协委员的提案，他说，有些时候，委员交办的提案并不归自己这个部门管。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每年都会有一些少委员的提案要求增加医疗卫生的投入，或者是要经费支持发展，但从国家各部门的职能划分来看，资金分配的职能在财政部，卫生部没有相应的职能。“可想而知，当接到这样的提案时，回复只能是泛泛的。”陈啸宏说。

如何写出好提案？有委员认为应该摒

弃太具体的问题，而对宏观政策建言献策；还有委员则认为应该不谈大问题，从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着手。对内容取向观点的不一，并不影响一个政协委员们都认同的建议：要写好提案，必然要在自己有所积累、熟悉的领域，进行深入调研，从现实国情出发。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部副部长高宝峰感慨道：“现在提案量多，但提案多，建议少，尤其是可行性建议少。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很多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像30年前，改革一出台，全民举手拥护，必然伴随着很大的分歧、利益纷争，做起来确实难度很大。”

在扎实调研基础上，一些提案被反复提出，最终促成了国家层面的改革——迟福林等全国政协委员几年来便坚持提交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提案，春节前夕，国务院批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重要的一步”便与委员们的建言有很大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陈东征直言：“选好题目，从实际出发，在提案的过程中，要锲而不舍，不能指望一个提案人家就接受了。毕竟，这是一个过程。”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温州金改试点一年 期待顶层设计

本报记者 庄庆鸿

“喜中带忧”，金融专家朱宁曾这样形容他感受到的温州金融改革现状。今天，记者在浙江代表团也几次听到这样的表述。

2011年9月，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出国躲债，引发了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而今，全国瞩目的改革试点即将满一周年，“温州危机”却开始了“第二季”。

2012年12月，以服装闻名的庄吉集团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它可说是温州标杆性的民营企业之一。但庄吉鞋业遭到船东弃船，银行又连续抽贷，逼得企业不得不向政府求援。

拖垮“眼镜大王”，“西装帝国”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对前者来说，是贸然投资的太阳能；对后者来说，是负债造起的几艘巨轮。

温州政府不得不新一轮强硬出手。因为温州众多民营企业有互相担保的传统，如果庄吉鞋业倒下，牵涉的互保金额将超过300亿元。

春江水未暖，鸭也先知。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至今，温州小企业主陆序还在期盼金春天的到来。

几乎和庄吉集团危机同时，陆序身边的一家小皮革厂，再也不开门了。“目前我们周围的小企业，去银行融资还是很难。”

面对民企的困惑，全国人大代表、温州

市市长陈金彪也坦承，温州民企依然有“两多两难”。指的是：“民间资金多，但是投资难；中小企业多，但是融资难。”

“目前温州金融改革还没有见到多少成效，融资难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一位温州银行界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温州金融改革不单纯是金融问题，需要国家制度、法律法规政策进行顶层设计。”陈金彪说。

这位金改的“大管家”，也有一肚子苦水。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们想多建设村镇银行的网点，但目前规定主要发起人必须是国有银行，民资才能进入。但是国有银行都有自己的网点，从源头上没兴趣、没动力、没义务帮民资发展村镇银行。这就需要制度上有所突破”。

更明显的问题，还出现在金改要向民间资本开放的诸多领域。现在社会资本如果要办医、办学，非盈利的机构要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法人”。

“这样的机构很难在银行融资，而且也很难拿到回报。”陈金彪说。

因此，温州在金改中先行试水，做出了一些改变。

“现在我们把社会资本办的医院、学校等分为两类：盈利的注册成民办企业法人，非盈利的注册成事业单位法人。规定盈利机构可以抵押教育设施融资；非盈利法人可以抵押教育设施以外的融资，让银

行评估认可。”陈金彪说。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民营企业企业家尤小平体会更深的，是另一个障碍。“在温州金融改革中，叫得最响的是利率市场化，但国有银行都不同意放开，这是金融改革最大的障碍。老百姓好不容易攒了一点儿钱存在银行，却赶不上CPI的上涨。”

要解决“两多两难”，陈金彪认为最重要的是规范制度，其次是加强监管。“我们对制度有四大体系的设计，比如建设民间资本管理中心、小微企业票据中心、金融法庭、金融仲裁院等，帮民间资本出了路子。但是监管必须跟上，否则又是新一轮的链条断裂风波。”

无论是民营企业代表，还是温州市长，都不能容忍金融改革空口无凭。“不能形成温家宝总理曾说的‘玻璃门、弹簧门’，看得见，又反复无常。”陈金彪说。

尤小平对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一席话印象深刻：“很多同志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

这位55岁的企业家几乎是马上把下句背出来了：“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取用，软办法不顶用。”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老的制度打破了，新的制度还没形成。温州企业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不改不行。”尤小平说。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科技部副部长陈丽娅：

奖项造假推荐部门要负责

高端访问

本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原春琳）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副部长陈丽娅今天表示，科技奖项评选将加强推荐部门的责任，推荐部门不能只推荐不负责。如果推荐部门推荐的项目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次就会减少其推荐数量。此外，个人推荐也要承担责任。

近几年的两会上，在高校科研院所知识分子扎堆的科技和教育界别，改革科技评价体制，尤其是科技奖励办法，一直是最热门的话题。不少委员达成一致共识：现行的科技奖励制度过于量化和物化，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2011年，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院士的带领下，一些科技界别的委员奔赴湖北、甘肃等地进行调研，最后形成了一份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报告，直指现行科研体制弊端。

陈丽娅说，在全国政协的提议下，科技部出台了奖励制度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思路是减少数目，调整结构，提高质量。

从去年开始，减少数目和调整结构就落到了实处。陈丽娅介绍，2012年度的国家科技三大奖更加强调原始创新和发明，加大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的比例，适当降低科技进步奖的比例；科技进步奖减少71项，减幅达25.1%，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的占比则从24.3%提升到35.8%。在工作程序上也将更加完善，比如公示将从提名开始一直到评审结束。

陈丽娅说，今年会继续加强公示，健全异议的处理。

不少项目评审的专家都遭遇过这样的问题：明明说是闭门评审，可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泄露，被评审对象总会找到专家并进行“公关”。

“我们确实很头疼。”陈丽娅说。据她所知，组织评奖的部门尽量想办法从程序上堵住这些漏洞，比如说，摇号选专家，进入评审期的专家要上交手机，可还是有一些信息会泄露。她表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会严肃处理。

针对地方和行业奖项繁多的状况，陈丽娅说，对地方和行业设立的奖项，按照规定，是要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备案，其原则是不能强制，只能指导。而奖励办对奖项不会照单全批，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她表示，科技部会导向一些科技含量很好的评奖，比如，以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命名的“周光召基金会地质科学奖”，希望借此引导更好的行业或者更高层次的民间奖。“这项工作正在在推进中。我们也不希望弄得太多。”陈丽娅说。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

抑制三公消费 建议发票“双实名”

本报记者 庄庆鸿 丁先明

在“三公消费”人人喊打的当下，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提出了抑制公款吃喝的新办法。

“近段时间，公款请吃之风得到了明显遏制。但是，我已经看到，铺张浪费、公款宴请大吃大喝有转入‘地下’的趋势。”贾康说。

目前在中央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下，不少公款宴请转到了内部餐厅，或者在报销时化整为零，更有甚者，“宴请单位成了一些酒楼最大的机密”。

“不可能只依靠纪委在豪华饭店长期蹲点，怎么防止‘死灰复燃’？”贾康认为，在公务消费上，目前的发票制度没能真正起到作用。

他指出，现在，机关单位个人或集体进行公务消费时，开票名称通常都是直接开单位名称。“这就导致只能进行总量监督，监管部门看不到真正的消费次数和单次消费金额。”

他举了一种常见的“钻空子”办法。“很多单位都有定点招待宴请餐厅，一般采取按年结账的办法，开一次或几次发票。这就导致最后做账时，只能看到全年消费总数。举例来说，一次消费两万元，就很可能存在不合理情况，而把这两万元拆开写成一百次消费，就不容易引起追查。”

“非实名的发票，更导致了假发票泛滥、领导干部容易推脱责任的问题。”

“在监督和追究贪污浪费责任时，往往发现一大堆发票的抬头都是同一个单位。这就很难判断这个单位里哪个人真正请客浪费、大吃大喝，而这个人往往是领导级别。”

他的建议是，凡“三公消费”内容的发票，都实施“双实名制制度”。

这里的“双实名”，是指“单位实名、经办人实名”。对后一点，他还特别强调了“在开票人出具身份后”。每一笔消费都有直接经办人的姓名，就大大方便了追查工作。当纪委或者审计部门核查公务单位的财务时，可以直接质问当事人，让其提供合理解释，“有效威慑公款浪费行为”。

“如果此举措能落实，抑制公款消费将不再那么含糊。”这位著名财经学家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本报北京3月4日电